

圖一 唐玄宗〈鵲鶴頌〉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唐玄宗〈鵲鶴頌〉墨跡上所鈐「部曲將印」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唐玄宗〈鵲鶴頌〉墨跡上所鈐「開元」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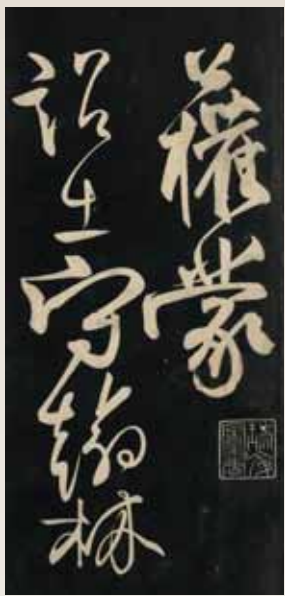
下限等斷代資訊的憑藉。例如院藏唐玄宗名下的〈鵲鶴頌〉墨跡（圖一），其上數見「開元」小璽印痕（圖二），恰鈐於墨跡本幅之上，又「開元」正為唐玄宗之年號，所以，若能確認「開元」印記的可靠度，便可推知〈鵲鶴頌〉墨跡成書年代不晚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即便「開元」印

鑑藏印外又一「章」

一件宋代的書畫作品之上，若有著元明清以來的鑑藏印記，通常可以理出一個流傳有緒的歷史陳述，進一步來說。其上若還鈐有標準可信的宋代印記，那麼，就可以增添該件作品斷代的可信度。只是，如果宋代書畫之上出現了唐代的印記，甚至是秦漢時期的印記呢？以下，便讓我們來略探這個有趣的現象。

緒論：名跡上的漢印

書畫作品創作完成之後，或作者自珍自賞、寶藏不出，抑或是流入他人之手，書畫作品便展開了其在歷史中傳藏的旅程。其間，不管是書畫作品的擁有者，或是因緣際會而得以對作品就目賞鑑者，都可能在作品上鈐押印記，留下「鑑、藏」的跡痕。而這些「鑑藏」的跡痕，若經過適當的考察釐析，往往可以綴組為過程明確的流傳史。進一步來說，書畫作品上的鑑藏印記，也可能是推定作品年代上



圖八 柳公權《蒙詔帖》及上所鈐「瑞文圖書」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圖十 「瑞文圖書」印記



圖十 傅趙孟頫《吳興賦》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傅趙孟頫《自書詩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瑞文圖書」、「廣仁殿」印記
如前段所述，何惠鑑在其文中討論這類印記可能是好事家所為以附庸風雅，但另一方面，何氏指出這類古印的鈐用，也可能是作偽者意欲以「古印」亂人耳目，例如他所考察〈摹周文矩宮中圖卷〉上特殊古印，皆見於明初沈津編成的《吳氏印譜》中，此正確指了作偽者仿刻的來源。而沈津所編的印譜，實根據《漢晉印

譜》而來，正因為「漢晉」年代高遠，傳世書畫作品，幾乎不存有漢晉可信之物，北宋大書法家米芾便言：「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故大抵見於是譜中的印記，就很難成為鑑藏家「鑑、藏」的跡痕，也都可以視作是本文討論的對象。而亦收於該印譜的「瑞文圖書」印記

（圖六），是本文所關注的「古代」印記，也是較為人熟知的印記。其不僅見於書史劇跡顏真卿《祭姪文稿》（圖七）、楊凝式《夏熱帖》上，也可於柳公權《蒙詔帖》（圖八）與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吳炳本《定武蘭亭》拓本中尋得。特別的是，院藏兩件傳為趙

記不可信，作品上宋代「宣和」、明代「晉府圖書」等印記，也可提供類似的斷代資訊。然而，這一卷上限為唐代的法書名跡，騎縫間鈐押的「部曲將印」（圖三）卻令人略感突兀，蓋該印為白文印，其白文線條方直平正而寬大樸厚，幾乎滿佔印面，是為漢印「滿白文」的標準風格，若再翻

閱明代王常收集古代印記編纂而成的《集古印譜》，其中不但收有九方類似的「部曲將印」，且是書凡例明言：「部曲將印」有百餘，不能盡收，惟刻稍異者。」更可知《鶴鶴頌》墨跡上所鈐之「部曲將印」為傳世常見的漢印樣式。另《鶴鶴頌》卷後「敕」字押署處的「別部司馬」（圖四），也



圖五 傳王羲之《大道帖》墨跡上所鈐「部曲將印」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唐玄宗《鶴鶴頌》墨跡上所鈐「別部司馬」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顏真卿《祭姪文稿》墨跡上所鈐「瑞文圖書」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瑞文圖書」印記 圖版取自沈津《欣賞編》一書

是同樣的狀況，其鈐於書作上者亦屬唐漢代古印式。而最讓人好奇的是，早於唐代的漢代印記，怎麼會出現在唐代的作品上呢？

關於這個問題，何惠鑑研究《摹周文矩宮中圖卷》時，亦及於此。氏著《澹巖居士張澂考略並論《摹周文矩宮中圖卷》跋後之「軍司馬印」及其他偽印》一文中，便指出這類遠早於書畫作品創作年代的漢印鈐押，很可能是好事者附庸風雅的作為，如院藏顏真卿《祭姪文稿》、徐浩《書朱巨川告身》鈐有「軍司馬印」，傅王羲之《大道帖》上有「部曲將印」（圖五），皆可能是好事者所為。然而，這一類印記，既不能提供斷代資訊，也有別於一般印記作為鑑藏者宣示擁有權或鑑賞作為的功用，是於「鑑藏」之外的他種印記，正為鑑藏印外的另一「章」。而本文便以考察這類印記為主，淺論幾方此種印記的由來與使用，從而略添學界對此類印記的認知，開展閱讀書畫鈐印的視界。

知印記的性質，判定「廣仁殿」較難作為推敲作品時代的依憑，相關流傳史的考定就會更快確立下來。

「四代相印」、「宜子孫」印記

回顧前段對「瑞文圖書」與「廣仁殿」印記的討論，雖可較有把握將其劃入本文所論鑑藏印外又一「章」的範圍，但不可諱言，這幾方書畫上所見的印記鈐跡，固然在形式上相當類同，其細部卻彼此有異，很難說是同一方印記所押印而成。再者，若這些鈐跡皆不出於同手所為，又怎能期待有足夠多的古印恰分屬多人所有，而其印式又大同而小異呢？這些同式印記間的真偽摻雜，固然是問題的一個解答。另一方面，人們對擁有古代印記的需求也值得注意：穆棣在〈米芾「參政帖」帖文考〉一文中，就對北宋蘇易簡家族的鑑藏印記「四代相印」，以及「四代相印」的由來有深入討論，並以傳世書畫上「四代相印」之所以印式不一，正是蘇家子孫又仿刻鈐用所致。這正顯示前代的紀念性印記，子孫很可能各自仿刻，表示其

孟頫書作的〈自書詩〉（圖九）、〈吳興賦〉（圖十）上，趙氏自鈐款識下方，正有「瑞文圖書」印記，兩件形式齊一而同為偽作，正好顯示了這類印記的鈐押，可能因於好事者的取用，也可能仿作以混亂人耳目所致。值得注意的是，〈故宮法書·第五輯唐顏真卿祭姪文稿〉一書中，卻引周密《志雅堂雜鈔》一書，指稱「瑞文圖書」乃是南宋高宗妃劉娘子印記，且此一說法，又出現在多位學者的論述中，故筆者有必要略加說明。今檢周密《志雅堂雜鈔》載王子慶所藏李公麟《草堂十志》之事云：（註一）前有「奉筆」大小印，向曾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閉關頌酒之齋」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於婦人恐不類耳。今錄其書人姓名於後……又有「瑞文圖書」。甲午三月四日攜來。

由文中可知，其對「瑞文圖書」的載記，是文末補述的順道一提，且文中「然於婦人恐不類耳」到「今錄其書人姓名於後」間，也已結束敘述而另起一段，故不應遽然連結到南宋劉娘



圖十三 「四代相印」印記 圖版取自沈津《欣賞編》一書

子身上，是以論者對於「瑞文圖書」印記歸屬的判斷，可能還有待商榷。其實趙孟頫書作上有「瑞文圖書」的出現，便已暗示了在前人的認知中，「瑞文圖書」或非南宋印記，再加上此印蛻影實收於印譜，又被印譜歸入漢晉時代的古印，自然也不是一般常見的鑑藏印記，其實屬本文所論的鑑藏印外又一「章」。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要理解某些特定印記的性質，前代印譜很可能是值得參考的重要資料。如「廣仁殿」印不但出現於顧愷之〈女史箴圖〉、傅王獻之〈中秋帖〉，與院藏吳彩鸞〈唐韻〉（圖十一）等名跡中，且只要



圖十一 吳彩鸞〈唐韻〉墨跡上「廣仁殿」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繼承的祖先榮光。穆棣並引明代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時豐坊為大收藏家華夏所撰〈眞賞齋賦〉，認為明代時蘇氏「四代相印」已落入華夏藏篋。後王裕民承襲穆棣的論證與說法，進一步說明「四代相印」印記其實有多人使用，人們往往也都以為自己所擁有的才是真正的北宋「古印」，鈐而押之以為古雅。只是，穆棣和王裕民都認為「四代相印」的鈐押，多少還是暗示著北宋蘇易簡所代表的時代下限。筆者以為，「四代相印」固然有部分代表蘇易簡家族鑑藏的意涵，但有些鈐用「四代相印」者，是把「四代相印」當作唐代以前的「古印」使用，屬於本文所論鑑藏印外又一「章」的範圍。這是因為前舉沈津所編之古印譜，亦收有唐文宗御賜的「四代相印」古印（圖十三）。再者，穆棣和王裕民對〈眞賞齋賦〉斷句亦有誤，以下逐錄穆、王二氏對〈眞賞齋賦〉的斷句：

白玉螭紐三印，今改刻瓢印曰：「眞賞」，方印一曰：「華夏」，一曰：「眞賞齋」印；東漢楊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紐，雕琢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碾花。

文中雖述華夏印記中有「四代相印」，但卻無一字及於北宋蘇家，反而是這段敘述華夏所擁有古印的文字中，生硬地出現了「東漢楊彪文」。但只要知道三國名人楊修之父楊彪正字「文先」，且其四世三公，則該段文字便可改句逗為：「東漢楊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紐，雕琢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碾花。」如此一來，「四代相印」的另一個身份，也就明顯可見了。換句話說，今見「四代相印」印蛻，既可能是根據源於蘇家藏收，並足以提供斷代依憑的跡痕；也



圖十二 「廣仁殿」印記 圖版取自《秦漢印範》一書

檢索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系統，又能發現《金史》雖無載廣仁殿肇建年月，卻有金章宗蒞臨廣仁殿之事，容易讓人將此印與金章宗作聯想。學者王耀庭先生在研究名作顧愷之〈女史箴圖〉時，或為回應這種聯想，便先假定此印記可能與金章宗的鑑藏有關，再從各方面反覆論證〈女史箴圖〉上的「廣仁殿」印，實無法作為金章宗收藏過〈女史箴圖〉的證明。而明代潘雲杰所編之《秦漢印範》所刊之「廣仁殿」印（圖十二），印式正與上述諸作上鈐者相當類同，又印譜中明載此印為秦漢古印，更可直接說明王氏考定的結論。其實，若先據印譜察



圖十六 明 唐寅〈高士圖〉(局部), 以及其上所鈐「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可能是時代上推至秦漢晉唐間的古印，為別出書畫上眾多鑑藏印記之外的一「章」，這些，都是「四代相印」的可能樣貌、指陳。

總之，對於這些不具推定時代上下限功能、又別出於「鑑、藏」系統的印記，正因其為相對是「年代較久遠」的「古印」，所以在追求古雅的需求場中，自然容易被翻刻、挪用，這些大同小異的印式，又更加混淆了斷代資訊的正確性。復次，古代印譜的的編集、刊行，不但將這些「古印」印式作有效更廣泛的傳播，也正向加強了該種印式的使用群。有別於標示專屬特定藏家鑑者的「獨特性」，成為相對容易取用的資源，他人可能對某些特定印式的仿摹、複製



圖十四 傳趙孟頫〈吳興賦〉墨跡上所鈐之「宜子孫」印記



圖十五 「宜子孫」印記 圖版取自《秦漢印範》一書

視作平常了。如果我們再翻閱潘雲杰所編之《秦漢印範》，就會發現書畫上相當常見的乾隆朝「宜子孫」印記（圖十四），其印式竟然早收於《秦漢印範》之中（圖十五），就不能不體認到這些鑑藏印外的印式影響之大了。

印式的載體：「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印記

考察這些印記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除了透過書畫傳藏而產生的印記圖像交流外，《印譜》的編成、刊行，也是印記圖像傳播的途徑，正因為這些中介載體的存在，這些印記才有條件被仿摹、被認可，成為博古與收藏的依憑。因此，在初步理解這一類印記的性質後，或許要在中介載體上投注目光。舉例來說，院藏明代唐



圖十八 《方氏墨譜》所刊「世掌絲綸」墨樣



圖十七 《程氏墨苑》所刊「世掌絲綸」墨樣



圖二二 清 乾隆 綸閣御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刊「用之協相」銘



圖二十 《集古印譜》與《秦漢印範》所見「子孫孫用之協相」印記



圖十九 《程氏墨苑》所刊「世掌絲綸」墨樣

寅〈高士圖〉本幅右下，押有一方大印（圖十六），根據幅後唐光所跋毀燒作品事件判斷，此印的鈐押，已在清代。《故宮書畫圖錄》第十八冊對此印的釋文為「子孫寶之勿休」，雖未詳印記擁有者為誰，但就其釋文看來，大抵是鈐印者希冀子孫能寶藏這件唐伯虎畫作，存之久遠、永不止息。但類同印式卻出現在明代墨譜《程氏墨苑》（圖十七）、《方氏墨譜》中（圖十八）。墨譜中雖無該印記釋文，惟其在印譜中往往伴隨女子織布，意喻臣子承應調理皇帝「綸旨」

的「世掌絲綸」圖式（圖十九），如此一來，其意似乎與「子孫寶之勿休」不類。特別是《程氏墨苑》中具載此墨式乃是為明代于慎行之後輩製作，目的在祝其能如于慎行般同樣登職輔佐朝廷，其意與「子孫寶之勿休」距離更遠。幸運的是，該方印記的樣式與釋文，在前舉《集古印譜》與《秦漢印範》二書中皆能得見，二書對此印釋文均為：「子孫孫用之協相」（圖二十），若不信任二本印譜之釋文，《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一亦載有宋代薛尚功對器物上同樣文字的釋文，其亦作「用之協相」（圖二一）。「協相」有協助、協助成事之意，與墨譜的圖式、功能較為相合，故唐寅〈高士圖〉上之印記釋文當以此為正。

另一方面，由釋文在字數上的相異，可猜測唐寅〈高士圖〉上印記仿自《墨譜》的可能性較大，而非仿學釋文隨附在側的印譜，不然，「子」旁不會忘記刻上複文符號以表「子」字重複（圖十六），由此也可知這一類「古印」的印式由來，實存在著各

式載體的可能。而唐寅〈高士圖〉上印記之以陽文為式，實有別於墨譜、印譜以及曾存清宮之「子孫孫用之協相」印記中的白文形式（圖十七、十八、二十），或許也是因為印式載體的不同所致。而院藏「清 乾隆 綸閣御墨」（圖二二）恰可提示一些線索，因為，其上填金模鈐的陽文方印，正為「子孫孫用之協相」，顯示兩者在形式上的關聯，而唐寅畫幅上的印記，也可能透過這一類媒介而得以成作、鈐押。總之，在澄清此印的釋文與由來後，此印記就可以歸入鑑藏印外又一「章」了。

結語：鑑藏印外又一章

就存世書畫作品來看，其上所鈐押之印記，數量樣式之多，已無法盡閱。若再計入僅見於文獻而今散佚不存的印記，更是難以全面掌握。因此，本文雖以別出鑑藏印記的另一「章」為述論對象，但要地毯式的一敘述，不但流於瑣碎，恐怕也有現實上執行的困難。且本文所具引的幾方印記，應略可代表這類印的一般狀



孫過庭〈書譜〉光學攝影檢測報告

定價：新台幣550元 / 菊八開 / 158頁

此書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合作，接續2005年《懷素自敘帖檢測報告》的調查報告書後，再度刊行以孫過庭〈書譜〉為主要的調查研究成果。眾所周知，孫過庭的〈書譜〉不僅是唐代活躍名書家的存世書蹟，可作為草書典範作品，其內容更是討論書法的出色書論，是具有相當價值的文化財。此外，〈書譜〉的獨創性書風、其「節筆」的現象以及「折行」書寫的實際面貌等，再加以與此相關的接紙問題等，向來是討論的焦點作品。藉著此次的調查，利用托紙對於光線的不同反應等，可以提供考察向來議論焦點的有效訊息。

晉唐法書名蹟 特展圖錄

定價：950元 / 菊八開全彩 / 256頁

晉唐書蹟歷經千餘年的流傳，在人為與時空因素下存世數量已相當稀少。本圖錄完整刊印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十五件題為晉唐人墨跡及前後題跋文字，堪稱本院晉唐書法名蹟大全。另有針對各件作品所撰寫的研究短文，一方面總和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以解析各件書蹟之重要性，後並附有參考書目，深入淺出地引導讀者進入中國書法藝術祕境。



圖二-三 《方氏墨譜》所刊「瑞文圖書」墨樣

況。因此，若能立基於此，或許可以望見更多可能深入的方向。舉例來說，筆者雖具引為例，圈定「瑞文圖書」與「廣仁殿」的性質，但翻查《人海記》卷一，中載清代查慎行奉旨考定「廣仁殿」時，亦使用《金史》所載考定，既與王耀庭先生的作法類

同，也同樣對該印的性質無法確定，可見印譜雖刊，但未必為各時人所見，自然也不會是印式傳播的唯一媒介。與此相對的是，當我們取閱明代最負盛名、並為後來製墨圖式楷範的《方氏墨譜》，其中模刻有「瑞文圖書」印式之墨，只強調其周圍四靈的吉祥古式（圖二-三），未見與南宋劉娘子相關的資訊，就可更確認本文對於「瑞文圖書」性質的推定。此外，刊載於印譜中的「古印」，不但已見有明代時人使用，且其印式與所刊「器物」，屢被墨譜引入墨樣之中，不但使人們對「古印」的認識與認知加

強，其中印式圖像的傳播以及其使用意涵，都值得再深入考察。另一方面，由對「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印記的考察可發現，院藏「清乾隆綸閣御墨」（圖二-二）墨樣雖自明代墨譜而來，但已將原屬於「世掌絲綸」墨樣的「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印記，轉用於意義略近的「綸閣」圖像，其中變化的機轉，或可繼續探究。（註二）當然，這些可能的考察面向，就是鑑藏印外研究的「另一章」了。

（本文的完成，得力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數位典藏計畫的協助，故本文實為該計畫執行成果的一部分，謹此申謝。）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就筆者所知，直接或間接沿用此論者，可見於西林昭一、江兆申、許郭瑛對〈祭姪文稿〉墨跡的流傳史說明，以及王耀庭先生對〈女史箴圖〉相關研究論述。另周密《雲煙過眼錄》亦載同事，但以《志雅堂雜鈔》敘事詳及年月，故以《志雅堂雜鈔》所載為論。
 2. 近代研究古墨最重要的學者尹潤生，記其曾見一盒「綸閣」墨，墨盒上鈐有「子子孫孫奉之勿替」印記，其書雖未附圖片，但筆者以為，此可能是尹潤生誤釋「子子孫孫用之協相」所致，這是因為乾隆皇帝一改明代墨譜傳統，將「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印記「綸閣」墨式結合，遂使兩者相伴成為常式，或尹潤生所見當為此類產物，惟仍待進一步確認。文見尹潤生，《墨林史話》，北京：紫禁城，1986，頁80。
- 參考書目：
- 一、何惠鑑，〈瀛嶽居士張澹考略並論《摹周文矩宮中圖卷》跋後之「軍司馬印」及其他偽印〉，《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期（建館三十五年特輯），1987，頁35-50。
 - 二、穆棣，〈米芾「參政帖」帖文考〉，《故宮文物月刊》，總160期（1996.7），頁67-87。
 - 三、王耀庭，〈傅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十七期（2004.9），頁1-31。